们来说，它是一份慰藉。

翟永明，中国当代优秀女诗人。1984 年其组诗《女人》以独特奇诡的语言与惊世骇俗的女性立场震撼文坛。1998 年于成都开设“白夜”酒吧文化沙龙，策划举办了一系列文学、艺术及民间影像活动。2010 年入选“中国十佳女诗人”。曾获“中坤国际诗歌奖”、意大利“Ceppo Pistoia 国际文学奖”、美国北加州图书奖翻译类奖项、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“杰出作家奖”、上海国际诗歌节“金玉兰奖”。

我想做自由的工作

《新民周刊》：从卡夫卡以来的，人类的恐惧——被瓦解消灭掉自我，一直存在。从这个意义上来看，自你写作的原点（上世纪80年代）至今，你的写作有什么样的变化？

翟永明：有一方面是一直都没有变的，我还是从生命本身出发。可能女性对这一点特别有深刻体会，我们都是从自己的身体出发。国外有一个女性艺术家，曾经说过一句“我的身体就是战场”（芭芭拉·克鲁格，美国女性主义摄影家，原文为“你的身体就是战场”）。即很多女性艺术家选择把自己的身体，作为一个表达的方式，比如行为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。对我们女作家来说，肯定更重要的也是从自己的身体和自己的体验出发。从自己的感受，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认识出发，属于完全个体的方式。也就是说：我们阅读，但并不是从理论出发；我们思考，但我们用身体去感悟和叙述。不管我的写作主题发生什么变化，比如说，我关注未来的发展、科技的伦理和环保的问题，但所有这些，都是从个人的感受出发，延展到大的群体。我相信跟我一样感受的群体应该很多。我基本上不太会在一个理论指导下去写作，更多的是从人生经历，最重要的是对世界不断的重新认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还有些变化体现在什么地方？

翟永明：80 年代，我对世界的认识，肯定跟当时整个社会环境和我们所处的位置有关。90 年代，又不一样，外部世界发生很大的变化。经济发展了，很多朋友下海了，外部世界就有很大的改变。我本人也会有很大的改变，因为要应对这个世界在不断变化。当然，还是按照自己的方式，首先要解决自己的生存问题。

我在国外待过，知道在资本社会里，个人是很脆弱的。80 年代，我从单位出来以后，只是找一些临时工作，有点像现在的工人日结。找到一份工作，干个半年，先把这一年生活解决了。成都人但凡有一点点生存的可能性，就不想做别的，属于比较懒散的族群，诗人就更懒散。但是到 90 年代以后，整个社会在转型，这样也混不下去了，年龄也大了，就开始想要做一个事情，但一定是跟自己喜欢的东西连在一起。我自己最看重的还是写作。我在美国的时候觉得要待下去就得进入他们那个体系，就得去学英文、进公司。我以前的单位条件比一些美国公司都好，我干嘛费了半天劲又回到原点了？我不愿意。其次，我把自由看得比较重，自由的工作，随心所欲。其实最早是想开书店，但肯定赔钱。后来在英国看到一个综合性的咖啡厅，有咖啡厅有书店还有画廊，当时特别喜欢。现在回忆起来，“白夜”满足了我的愿望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新开的玉林西路“白夜”，真是一个聪明的决定。当时决定要关掉宽窄巷子的“白夜”了？

翟永明：我做生意基本上靠直觉，很多人要算一下房租、人力成本，全算完以后，看能不能做，我从来没有。当年我一看到玉林西路那个空间，一冲动，马上就接下来了。后来房东死活要把空间收回去，开过各种店，都没能开下去，就又租给别人了。2021 年 7 月，这个空间可以转出来了，问我要不要。我也是一分钟没有犹豫，马上说我要。二房东要收转让费，大房东听说了，也给我涨了房租，我现在租下来是整条街最高的价格。没办法，因为我肯定想回到原点，对方也很了解我的心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回到原点，也是奇迹。20 多年来（维持“白夜”）一直很难吗？

翟永明：当然很难，一直很难。2000 年之后（为了贴补“白夜”），我写过好长一段时间专栏，什么都写过。我姐（著名作家、编辑莫然）